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季进 编选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二

◆ 苏州大学出版社

王 尧 林建法 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 二

季 进 编选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全6卷/王尧,林建法主编;郭冰茹等编选.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72-0081-4

I. ①中… II. ①王… ②林… ③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349 号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二

王 尧 林建法 主编

季 进 编选

策划 沈海牧 朱绍昌 倪浩文

责任编辑 郑亚楠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200.25(共六卷) 字数 3 790 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0081-4 定价:500.00元(全六卷)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目 录

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	李何林(1)
初读《创业史》	冯 牧(7)
《红旗谱》中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许之乔(15)
《山乡巨变》琐谈	黄秋耘(45)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严家炎(53)
题材问题	《文艺报》专论(60)
论历史剧	吴 晗(67)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	茅 盾(71)
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细 言〔王西彦〕(151)
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	何其芳(165)
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	
——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	康 濯(192)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	《人民日报》社论(208)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巴 金(214)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	朱 寨(219)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节选)	蔡 仪(229)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邵荃麟(244)
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254)
关于题材	唐 弢(262)
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	
——给《诗刊》的一封信	郭沫若(270)

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柳 青(273)
周炳形象及其它	
——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	蔡 葵(279)
“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文艺报》编辑部(289)
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	柯庆施(304)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326)
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节选)	赵树理(339)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351)
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于会泳(369)
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	
.....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374)
编后记	(382)

李何林

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①

有人把文学作品分成三类：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或都低的作品；二、思想性较高艺术性较低的作品；三、思想性较低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相一致的作品，也有不相一致的作品。那么，究竟有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有人把思想性解释作“具有进步的思想”才算有思想性，有反动落后思想的作品不算有思想性，我想这是不大合适的；反动落后的思想也是一种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作品，应该也是有思想性的。思想性不但有高低强弱之分，同时也有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之别。至于艺术性，有人说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反映生活越真实，艺术性就越高。又有人把艺术性理解为描写的技巧，有技巧就是有艺术性。我以为艺术性主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但也包括描写的技巧；要真实的反映生活也需要描写的技巧。毛主席说：“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②这里所说的“某种艺术性”，据我的体会，就是那些反动作品的某些描写的技巧：譬如结构相当完整；语言文字明白通顺，甚至漂亮华丽；故事情节安排得当，引人入胜等等。但是这种作品最缺乏的还是“生活的本质真实”的反映。虽然它可能有生活的某些细节真实的描写。凡是缺乏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反映的作品，虽然有某些描写技巧，带有“某种艺术性”，严格地说都不能算是“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因为它们没有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

① 原文刊发后，《文艺报》1960年第1期转载，并加编者按：“李何林同志这篇文章，题目上标出的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认为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最近《河北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在进行讨论。我们同时把它刊载出来，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② 本文所引毛主席的话，均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也就是毛主席在上面两句话的下面所说的“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些歪曲现实粉饰现实、具有“反动的政治内容”的文艺,当然没有“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也就不可能有完美的“艺术的形式”,不可能有较高的“艺术性”。这是反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内容不真实,也就是思想性不高。艺术性也不会高。内容不真实,它的思想的感染人说服人的力量也不会强,所以内容反动的作品,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二者是一致的;譬如过去中国法西斯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就是如此。

那么,内容不反动而有一定程度进步或相当进步的作品,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会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呢?我认为也都一致,没有不一致的作品。例如蒋光慈的小说,乍看起来似乎它的艺术性比较低,思想性比较高:它的叙述语言里面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的政治态度和一些进步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概念;又每每通过人物的口说出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或表达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概念。但是它的形象和典型大多数都是没有个性的类型,不是有血有肉的,概念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真实性都不够,对读者的教育作用和说服力量也不强,也就是思想性不高。只要概念化地表现一些正确的政治观点,并不等于思想性就高。毛主席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蒋光慈的小说就是近于“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这一类,当然它多少还有一些艺术力量。它的艺术力量和它的思想性不高是相一致的。它的艺术性方面的“粗糙”和它的思想性方面的“粗糙”是相一致的。至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初期,应该经过“粗糙”的阶段,蒋光慈小说在初期革命文学中所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那是另一个问题。“粗糙”是任何新生事物必不可免的阶段,蒋光慈的小说就是这种新生事物。

又例如:五四时代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冰心的小说,是不是思想性低和艺术性高的作品呢?我看也不是的,它们二者也还是一致的:这时期冰心的小说,思想是落后的,有一些甚至是反动的。譬如在《超人》中宣传“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这是抹煞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的骗人的话。又如,在《斯人独憔悴》中,表现五四时代屈服于封建大官僚父亲压迫之下的两个青年,在当时也是不够典型的;一方面表现作者对于这两个青年有极微弱的同情,一(方)面也表现作者和这篇作品的反封建思想都是极微弱的,反映了当时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右翼”的思想。《超人》的思想是反动的,这种反动思想的思想性也是不高的,因为她把她的人物以至全篇作品当作

宣传她的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之爱”的传声筒,实际上是一篇反现实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艺术性也是很低的。人物和故事都给读者以不真实之感,思想性和艺术性倒是相一致的,都不高。《斯人独憔悴》的人物,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是不够典型的,也就是:不是五四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五四时代英勇不屈地反封建反帝的青年的典型,像恩格斯所批评的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缺点一样:人物远远落后于现实了。不过《斯人独憔悴》中的两个青年虽然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当时也可能还会有的,所以还有一定的真实性,相应的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较之《超人》都要好一些;但是二者仍然是一致的。并不是一篇思想性高艺术性低,另一篇艺术性高思想性低。二者都不高。

所以我认为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并且把它弄清楚的。常常有人说: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都有思想性高艺术性低,或思想性低艺术性高的作品。好像李后主、李清照、李商隐、杜牧……以至徐志摩、冰心、戴望舒等等,都是艺术性高思想性低的作家;好像有一些歌谣和现实主义的古典诗歌、小说和戏曲以至有一些现代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性高艺术性低的作品。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呢?我们所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都需要讨论。

与思想性艺术性问题有些关系的问题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有人以为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可见思想性重要,艺术性不重要;并由此推论出:只要思想性高(革命的思想性),艺术性低也不要紧,也就是认为有思想性高艺术性低的作品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高低问题,是否一致的问题,是一篇作品的自身内部问题;而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则是我们评价作品的标准;我们不管它们的思想性或艺术性都高或者都低,首先看它们所表现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是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来评价它们的好坏。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毛主席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对于蒋光慈和冰心的小说,虽然认为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高而且都是一致的,但当我们评价它们的好坏时,我们要说蒋光慈要比冰心的好一些(虽然1931年以后冰心的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所提高和进步)。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这是我们对于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的作品的评价标准。对于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的作品,我看也是这样评价;譬如要问《水浒》和《红楼梦》究竟那一种“比较”好时,我同意“《水浒》比较好”的意见,这由于几百年来《水浒》的社会政治作用或影响比《红楼梦》好。如果《红楼梦》和《金瓶梅》比时,当然是《红楼梦》比较好了。在比较两篇作品的好坏时,我们的评价标准是这样,在就一篇作品来评价时也是这样,都

是“政治标准第一”。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任何阶级首先从政治上来评价作品，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跟着而来的是“艺术标准第二”。也仅仅是“第二”，是评价时“次要”的标准，并不等于不重要，甚至是不必要了，这就是由于思想性的高低和艺术性有密切的联系，像我们上面举例说明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里面，已经包含有“艺术标准”在内，不过我们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也没有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

总之，我认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艺术性不等于描写的技巧，虽然真实地反映生活需要描写的技巧。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任何阶级评价作品的标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把它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混淆起来，尤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可见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不一致的，甚至只要政治性不要艺术性了。

作者附记

这是我去年9月写的一篇短文，《新港》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发表。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把题目改为《有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致的作品？》，寄给了《文艺报》。过了几天，又去信说“不要发表，还须修改”，就退回来了。以后得到几位同志的批评和帮助，我才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错误，我愿意把它发表出来当作反面教材，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在斗争中我希望而且相信能够得到改造和进步，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划清界限。

我为什么写这篇短文呢？我的学生有时反映说，老师分析作品往往只有干巴巴的思想性（就是思想性也不一定讲得好或讲得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等讲到艺术性时就话不多了；也没有把二者讲成血肉的关系，某种思想性是必须通过某种艺术性才能表现的。我想：怎样才能把作品分析得有血有肉，讲思想性时同时就讲出它的艺术性呢？因为我觉得二者是一致的，统一的：某种思想性一定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艺术性来表现。同时，又曾听见有人说：“分析作品要作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大意）不也是说二者是一致的么？但是又看见有人说：编写中国文学史，除了重点论述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以及思想性较高艺术性较低的作家作品以外，也要选一些思想性较低艺术性较高的作家作品。（大意）这样，思想性和艺术性又是不一致的了。我平常也认为有思想性较高艺术性较低的作品，例如蒋光慈的小说；有艺术性较高思想性较低的作品，例如李煜、李清照的词和齐白石的画等。但是，我又想：究竟什么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呢？作品中有进步思想算有思想性（这是通行的用

法),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是否也可以说它有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这两个词,不都包括两方面么?)它的反动落后思想和它的艺术性是否一致呢?所说的“艺术性”,除表现技巧以外,还有别的没有?这三个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都不能解决。但我也勉强提出了我对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得出与我自己原来看法也不相同的错误结论:“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致的作品。”来表示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由于《新港》编辑同志几次催稿,遂匆忙地把这个问题写成了这篇短文,提出了问题和看法,希望能够得到讨论。

文章的题目上原来没有“小”字,写好以后,觉得十年来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很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所以就在原稿上加上一个“小”字。哪知道经过几位同志的分析和帮助,才知道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涉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的大问题,是我们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然而也是并不奇怪的: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得到好好的改造,随时就会暴露出来,要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早点暴露出来,可能早点得到批评和帮助,早点得到纠正和改造,坏事会变成好事的。

经过几位同志的分析和帮助,我初步认识到以下四个主要错误:

一、说“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致的作品”,是不符合文学史现象的实际情况的,实际情况是有“不一致”的作品。也不符合毛主席在《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然是“我们的要求”,可见还有三个不“统一”的作品。我原来把这三个不“统一”,理解为与“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致”是两件事:我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不等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因为艺术性包括形象和典型,已经涉及内容了。同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例如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民歌的思想性的高低强弱也不一样,所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并不等于思想性。我这些理解是错误的,毛主席所说的这三个不“统一”,就是指的思想和艺术性的不一致。我从概念上来钻牛角尖,而且拿毛主席的话来附会我的“一致论”。这种错误的理解虽然没有表现在我的这篇短文中,但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暴露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是如何的不够和错误的理解。

二、说“艺术性主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说“本质的真实”也好不了多少),也包括描写的技巧”,这“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是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或世界观的,究竟是用什么阶级立场或世界观去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资产阶级反动作家不也可以说他们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么?我原以为要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当然要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原提法的本身是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立场的。

三、说“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

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这样,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决定于所谓“真实性”,错误仍然在于这种“真实性”没有阶级性,看不出作家用什么阶级立场或世界观写的“真实”。而且思想性既然等于艺术性,有了艺术性也就有了思想性,有了艺术也就有了政治,不是“艺术即政治”的思想是什么呢?

四、把思想性、艺术性、真实性三者等同起来,实际是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同起来,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不是取消了思想性,就是取消了艺术性。因而不是取消了政治标准第一,就是取消了艺术标准第二;二者等同起来了,还有什么第一第二呢?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就可以了。所以,只有说:“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里面,已经包含有艺术标准在内,不过我们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那么,既然思想性和艺术性一致,说艺术标准第一里面包括有政治标准在内,不也可以么?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所以,就这篇文章说,我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但我的原意是想为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辩护的:我们的政治标准里面已经有艺术标准,我们并不是只要政治,不要艺术;只要思想性,不要艺术性。哪知我的阶级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使结果适得其反了。我的根本问题在于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的继续加紧改造。

以上四点初步认识是很不深刻的,有一些也可能是错误的,就一并作为同志们批评的对象吧。

至于这篇短文章其他方面的错误(如对蒋光慈、冰心的评价问题,是否轻视描写技巧问题等等)还有它的危害性,在这匆促的时间内和短短的“附记”里都不可能讲了。思想检查也是在更多的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后才做,要好一些。敬请同志们给以批评和帮助吧!

李何林

1960年1月4日

——原载《河北日报》1960年1月8日

冯 牧

初读《创业史》

作家柳青同志不久以前在《延河》文学月刊和《收获》上发表了他的近作《创业史》的第一部。这是作家在近几年来以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并不仅仅以作家的身份),深入农村生活以后的又一次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在继《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之后创作的、以我国西北地区农村劳动人民生活 and 斗争为题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现在我们所读到的,还只是这个气魄宏伟、规模巨大的作品的第一部,而且,据说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前作者还要进行某些必要的修改。因此,现在我们自然还难于对整个作品做出详尽而准确的判断。那种全面而精当的思想和艺术上的评价和分析,恐怕只有在作品最后完成并且经过广大读者阅读的考验之后,才可能做出来。

但是,虽然如此,我觉得,对于像《创业史》第一部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虽然暂时还不能使我们窥见全貌,但从一开始就能够以它深刻的主题思想和强烈的艺术力量打动读者心灵的作品,及时地谈谈我们对于它的最初的印象和感受,仍然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在近几年以来,我们曾经兴奋地读到过许多成功地描写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我们有许多作家长期地生活在农村当中,并且把反映我国广大农村所发生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作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内容。这一类的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新旧意识的斗争和冲突的作品,已经构成了我们文学创作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几年来在我国农村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群众运动,无论从它的斗争的尖锐、剧烈和复杂的方面来看,或是从它的影响的巨大、广阔和深远的方面来看,它都是那样地(的)丰富壮丽,那样地(的)深刻生动,以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虽然我们有着许多正确地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好作品,但是,那种能够丰富地深刻地反映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真实面貌的作品,那种能够全面地历史地描写出合作化运动在广大农村中所产生的深远剧烈的影响和变化的作品,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看,都还是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

要求的。就这一意义上来看,《创业史》在刚一发表之后立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是,《创业史》第一部受到了读者的赞美难道仅仅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吗?自然不是。《创业史》所以为人所称道,主要是由于作品所达到的无可置疑的高度的水平,由于它的深刻的主题思想和丰满的艺术形象。我觉得,虽然在《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表现的,还只不过是全国农村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那些年月的生活,而作品当中所集中描绘的,也只不过以西北终南山麓农村中一个劳动互助组的成长和发展为中心的斗争故事,但我们却可以毫不迟疑地肯定: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

《创业史》里面所反映的是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但是它是那样气魄宏伟地为我们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作品里,作者为我们所描绘的,并不只是一幅简略而单纯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平淡无奇的图画,而是一幅深刻地展示了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前进道路的色彩鲜明的生活画卷。《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描写的,还只是农村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阶段,而且其中也并没有多少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和曲折离奇的故事。作品的情节几乎可以说是简单的:它的中心内容,只是表现了在土改以后农村中开始了新的阶级分化的时候,一个村庄里的几家农民的生活变迁和思想行动。故事是围绕着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梁生宝所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来进行的。在新的革命运动来临之前,这个主要是由贫农组成的“穷棒子”互助组,在农村自发势力日益滋长的形势下,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包围。这片坚持在个体所有制汪洋大海当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受到了自发势力的冲击。然而坚强的共产党员守住了阵地,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击败了自发势力的进攻,发展了集体事业,终于以实际行动为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故事情节确乎是平凡无奇的。但是,我觉得这丝毫也不能影响作品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因为作者在这里所要表现的,不只是现在人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通过人们的劳动和斗争,为我们指出了生活河流的来源和去向。作者把他的作品题名为《创业史》,我想是绝非偶然的,他在作品里所描述的全部内容,不正是农村劳动人民怎样创造了和将要怎样创造着自己的事业的历史么?在解放前的世代里,包括作品主人公梁生宝的父辈祖辈的年代里,人们为了创造事业而奔波,而斗争。但是,人们劳碌终生所苦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份小小的个人产业,一份能够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可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的这种卑微的理想,也是难于实现的。在旧社会里,大多数农民的创业史,只不过是一部劳苦

史,辛酸史,一部被剥削和被压榨的历史。而在解放后的年代里,人们仍然为了创造事业而劳动,而斗争,但是,人们辛勤劳动、孜孜以求的,却已经是另外一种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集体劳动和共同富裕的事业,永远根除剥削和贫困的事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很快地懂得了这种历史发展趋向的。在他们当中,有着决心为创人民之业而奋斗的人,有着企图为创个人之业而奋斗的人,也有着在二者之间动摇徘徊的人;在他们之间,就不能不展开一场广泛、尖锐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集中描写的,就正是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尖锐的斗争。在这里,作者把他笔下的一个村庄——终南山下的下堡村——当作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并且通过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些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喜悦和痛苦,团结和分化,鲜明地、刻划入微地反映了这样一场尖锐的围绕着“创业”问题上所发生的革命变革的全部运动过程。

说《创业史》这部作品能够使人感到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的革命斗争,是不是意味着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仅仅是为我们揭示了问题和矛盾,或者仅仅是描写了一些足以反映斗争过程的事件和生活图景呢?当然不仅仅是这样。我在这里所讲的深刻的斗争,并不只是指的某种不同观念的差异和冲突,某种事件的转换和发展,而且也指的是各种不同人物和不同性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不同性格的矛盾和冲突,才能真正具体地、富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斗争的全部深刻性和尖锐性来。而《创业史》的作者就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丰富内容,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场决定了农民生活命运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的。

《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在他们当中,包括了几乎是农村里各种不同阶层和阶级地位的人物的形象;他们不仅是富有阶级特征的人,而且是富有性格和个性的人。作者就正是依靠了对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刻划的途径来完成他的再现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的繁重课题的。比起对于故事情节和事件发展的叙述来,他更着力于对于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描绘。关于这种作(做)法在艺术技巧上的得失,我们且不必妄下判断,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而确切的,就是:这种对于人物精神活动的淋漓尽致正面描写的结果,使作品出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人物形象。而且,并非由于别的因素,恰恰正是由于这些描写得生气蓬勃、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生动地看到了农村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的鲜明图景,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了广大农村历史发展法则和走向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当我们读罢作品掩卷凝思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中首先映现的,并不是什么引人入胜和新奇动听的情节,而是一系列活跃如生的农民人物群像。在他们当中,有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像坚决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共产党员、平凡而又光辉的英雄人物梁生宝;

像具有强烈的阶级情感和高贵品质的贫农积极分子高增福;像聪明敏锐、求知若渴的新型农民欢喜。在他们当中,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像饿狼一般顽固而阴险的富农姚士杰和贪婪成性、损人利己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在他们当中,有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两面性的代表人物:像徘徊在集体事业和个人发家的歧路上的新中农郭振山。在他们当中,还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物:像美丽、勇敢和富于幻想的农村姑娘改霞;像淳厚、正直而又带有浓厚保守思想的梁三老汉;像封建意识和奴才思想的维护者、可厌而又可怜的“古时人”王瞎子;像生宝娘、任老四、梁秀兰、韩培生、拴娃等等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这些人物,不管他们是贯串全书的主人公,在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者只是在书中偶然出现,只发出了流星般的闪光,却都能够在读者的思想里印下了深刻而清晰的印象。这一批或繁或简、但却同样鲜明的人物群像,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物形象,以他们各自的命运,深深地吸引着读者,把我们带进到他们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间去,使我们对他们产生了深挚的爱情,或是强烈的憎恨,或是出自关切的惋惜之情。这些人物形象,以他们之间的纷繁万端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为我们织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炫人眼目的农村革命斗争的广阔的生活画卷。

这些人物形象,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创造方面来看,有不少都是值得我们来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的;但是,在其中,对于读者最富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应当说首先是那些正面人物的形象,或者说,首先是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的形象。我们以为,这几个先进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农村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光辉的形象,应当被看作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在有些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里,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作品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合作化运动,相当成功地刻划了一些人物;但是,在它们当中写得最生动的,都大多是属于那种反映了中农的两面性和某种落后因素的农民的形象;人们也曾努力来写好农民中先进人物的形象,但它们和上述那些形象相比,却往往相形见绌。这种现象(即使是暂时的现象)说明,对于我们某些作品,如何创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描绘新事物的萌芽成长,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应当说,我们从《创业史》当中,却获得了和上述截然不同的印象。这部作品里对于落后农民和反面人物的刻划是出色的,但是,作品里对于正面人物的描绘,却焕发着更为耀目的光彩。

在众多的正面人物当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

谈到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就不禁使人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话来。在一篇关于合作社的通讯的按语中,毛主席曾这样写道:“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

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①在《创业史》中给人带来了深刻难忘印象的梁生宝,不正是这种农民当中的新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生动逼真和富有典型意义的写照么?当然,梁生宝这个人物的意义,还不只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新生力量和新的思想,而且也在于从这个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当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血肉饱满的、真实而丰富的新人的艺术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是的,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梁生宝在作品开头给人的印象是平凡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工作经验的普通农民。但是,生活给了他严峻的锻炼。在解放前所过的“地下农民”的生活,应当不只是考验了他的生活意志,而且也提高了他的阶级观念和斗争观念。因此,在刚一解放后,这个懂得事情还不太多的青年农民立即投身到战斗的革命队伍中来,是十分自然的事。他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经历使他很快地就抛弃了对于有些农民是很顽强的对于土地的私有观念,而接受了一种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观念。在他身上固有的那种劳动人民的美好品德,一经和战斗的革命思想结合,就立即发出了新的耀目的光辉。而作者在整个作品中,正是通过了对于这种新的光辉的反复的多方面的描绘,来刻划着他的典型人物形象的。他并没有让这个人的活动去占作品中太多的篇幅,但是,通过“买稻种”、“割竹子”这样一些精彩动人的章节以及关于他在互助组工作上坚持党的路线、和一切困难进行顽强斗争的那些篇章的深刻描写,这个体现了崇高共产主义风格和新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就十分突出和高大地在读者眼前站立起来了。在读完作品以后,我们不能不从这个形象受到深深的感动和教益:在这个貌似平凡的普通劳动者身上,是蕴藏着多么深厚而崇高的新的思想和品格啊。那种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风格,那种忠心为党、大公无私、坚韧顽强、朴素勤劳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品质,在他身上是表现得多么自然而单纯、又多么鲜明和丰满啊!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在梁生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精神状态,都体现了这种在集体事业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个性。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个性,才构成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深刻内容。

在《创业史》中的另外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贫农高增福的形象,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是一个虽然在精神面貌上不如梁生宝丰富,但同样写得光彩照人的形象。高增福是一个中年的贫农,有着比梁生宝更为长久和更为痛苦的生活经历;残酷的阶级压迫给了他一个沉默寡言的性格,他既不诉苦,也不埋怨,只是“用咬牙切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204页。

齿的沉默来抵抗命运的一切打击”。这是一种妥协的性格吗？不是。在高增福身上你根本找不到一丝妥协的影子，渗透着他的全身的，是那种和任何剥削者决不两立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情感。因此，虽然他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但他给自己规定的生活道路却是坚定不移的。“世上只给他留下一条路——跟共产党走！”他暂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思想上“在党”的人。他所以还没有入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他“能力低，起作用不大”，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于党的由衷的爱护，害怕由于自己水平低而降低了党的威信。但不管怎样，高增福所走的是一条坚定的道路——从半无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队伍的道路。可以认为，高增福这个人物在精神上是梁生宝的血缘兄弟；但是，不同的生活经历却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性格：一个是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崭新的性格；而另一个，则是一种正在竭力从旧社会的一切精神上的负载中彻底解放出来，并且坚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性格。

作品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人物，这便是新中农郭振山的形象。郭振山是共产党员，是农民其中的一个精明干练、精力充沛的基层干部。他也有过自己的光荣历史：在土改时期，他是群众运动中起过骨干作用的威信卓著的积极分子，这使他一直置身于全村的行政领导职位上面；不论他自己或是他的全家都以此自豪。但是，当革命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同时发生了变化；现实生活对他提出了新的问题。他原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和争取个人解放而参加到革命队伍里面来的，但现在，生活法则却迫使他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往何处去？是服从党和人民的意志，和人们一同走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服从个人的欲望，带领全家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他是珍重自己的荣誉的，这一点使他和党组织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他不愿意割断的联系；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又执拗而顽强地把他拉向背离党的方向上去。在口头上，他是乐于拥护国家的政策法规的，但在实际上，他却是在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就实行了他个人创家立业的小“五年计划”了；他的一切热情和精力都在为了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的生活水平而奋斗。这一切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不能不使这个全村最老的党员和另一个党员梁生宝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虽然暂时还由于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尚未到来而没有达到正面决裂的程度；但不管怎样，坚持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欲望已经在他思想中生根发芽；在他的头脑里，富裕中农的思想已经把他的少许的共产党员思想排挤得丧失殆尽了。等到这个徘徊在歧路上的人物在作品的最后章节里出现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徒有共产党员虚名的富裕中农思想的代表者了。因此，尽管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批判和指责从始至终都还带着略嫌温和的口吻，尽管作者在作品尾声中还给了他一个重整旗鼓、改弦易辙的机会，